

田余庆著

拓跋史探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拓跋史探

田余庆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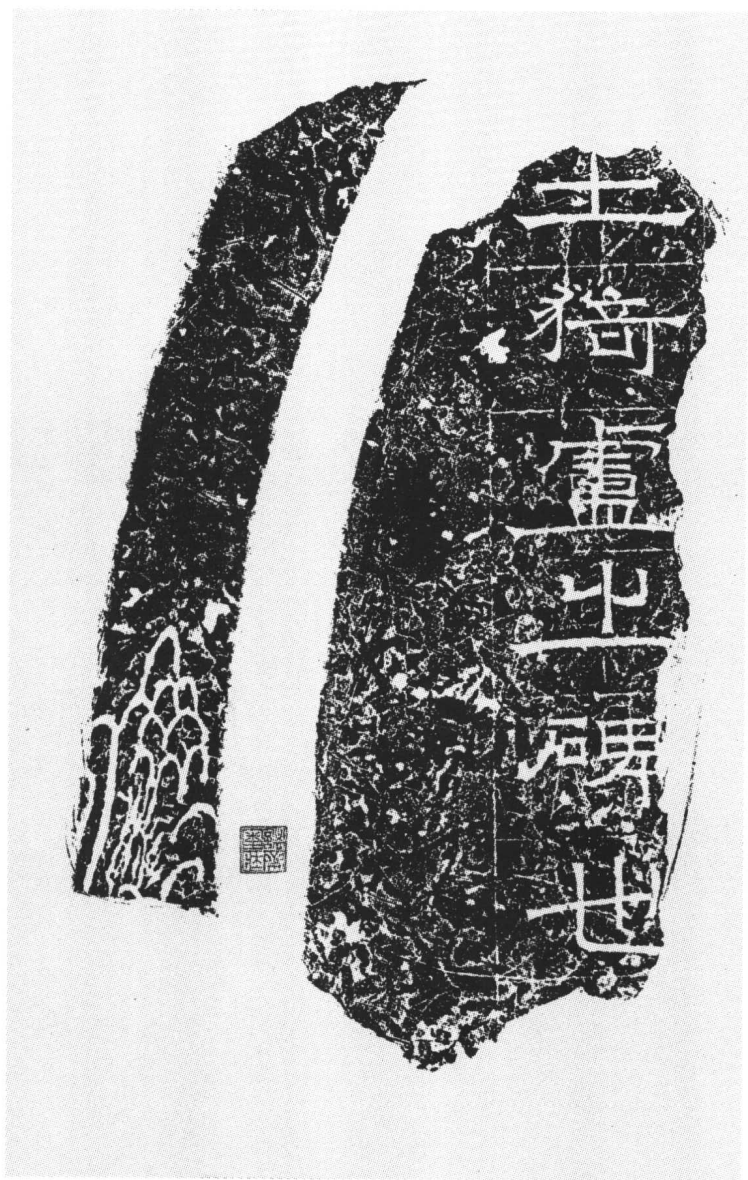
拓跋史探/田余庆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3

ISBN 7 - 108 - 01788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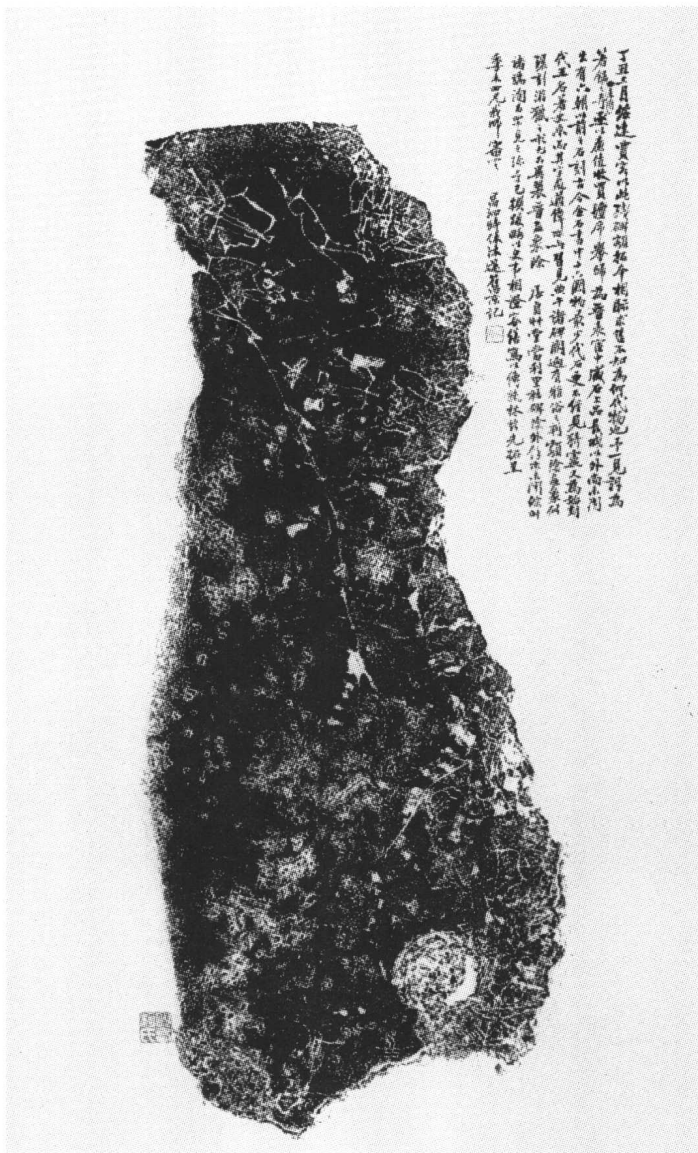
I . 拓… II . 田… III . 鲜卑 - 古代民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262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41 千字
印 数 0,001 - 5,500 册
定 价 24.60 元



“猗卢之碑”残石拓片(阳面)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猗卢之碑”残石拓片(阴面)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目次

前 言 1

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 9

一 《魏书》“子贵母死”所据的汉典和旧法 10

二 拓跋部早期君位传承中后妃的作用 15

三 君位传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 24

四 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 31

五 子贵母死制度的几个问题 47

六 小结 59

贺兰部落离散问题 62

——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

一 贺兰与拓跋 63

二 贺赖头徙平舒与贺讷总摄东部 65

三 道武帝离散贺兰诸部落 69

目次

四 贺兰部落被离散以后的余波 _____ 71

独孤部落离散问题 77

——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

一 前秦灭代以后的独孤部 _____ 77

二 刘显引窟咄争位和道武帝离散独孤诸部落 _____ 79

三 刘奴真与刘罗辰 _____ 83

四 部落离散以后的独孤部民 _____ 88

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 92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108

——《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

一 缘起 _____ 108

二	拓跋东、中、西三部状况与《序纪》 所见惠帝、炀帝东奔事	112
三	惟氏、维氏与祁氏	126
四	代谷的地理背景与西晋 护乌桓校尉的广义职能	131
五	东木根山地名的来历	137
六	两种类别的代北乌桓	146
七	拓跋内乱与乌桓动向	154
八	前燕云中之戍 ——代北周边关系之一	165
九	朔方局势与前秦灭燕、灭代 ——代北周边关系之二	170
十	灭代后前秦对代北乌桓的处置	178
十一	拓跋与代北乌桓的共生关系	187

【附】	补充与讨论两题	曹永年	203
-----	---------	-----	-----

《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 217

——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

- 一 《真人代歌》释名 217
- 二 《代歌》、《代记》及其与
《魏书·序纪》关系的推测 225
- 三 国史狱事造成的史风问题 235

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

拓跋史迹的探讨 244

- 一 关于祁皇墓 245
- 二 草原部落大会与平城西部的郊天坛 250
- 三 新平城迤南的拓跋史迹 254
- 四 关于祁后事迹的两个疑点 259

【附】关于“猗卢之碑”残石拓片 261



前言

收集在本书中的拓跋史文章,是近几年陆续写成的,旨在探路,所以名曰《拓跋史探》。文章中自己感到发掘了一些问题,解释了一些现象,增长了一些认识,但由于资料不足,很难说都准确,虽经此次出版前较大的增删修改,还是只能算探路文章。

探究拓跋史,前人已做过不少工作。他们是开拓的前驱,我不过是踵迹前人,越趋而进。近年以来,由于未见有多少新史料出现,史学界在这方面探索的热情显得比较消沉。希望我所尽的绵薄之力能引起有志者的兴趣,一起走上探索之路。

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底是五胡

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这就涉及拓跋部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代北地区活动的早期拓跋部及其建立的代国,大体与五胡十六国同步,发育程度不如其他胡族,却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地域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历史大体完整的一“胡”一“国”,虽然史家并未列之于五胡十六国之中。拓跋部百余年来孳生繁息于代北,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的稳定环境,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地统一北方的北魏。

探索代北拓跋的开国前史,我选择《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题目作为切入点。道武帝为了确立、巩固拓跋皇权,稳定长子继承君位的秩序,竟然施行了一种从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贵母死”制度,而且这个乖谬绝伦的制度竟然能与北魏政权相始终。这不是道武帝个人的“创制”,而是有更深层的拓跋社会内部背景。也就是说,拓跋在部落联盟中与其他部族关系复杂,可能留下什么祸根,因而在以后的北魏历史中产下子贵母死制度的怪胎。

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在部落联盟时期,拓跋君长之妻或母是颇具敏感性的人物,她们所属的部落往往通过她们,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特别是君位继承。拓跋部落联盟的维持,拓跋部在联盟中君长地位的巩固,往往要依赖拓跋母后,而且还要依赖母后外家部落。这就是祸根所在。北魏

建国称帝,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跟着外家部落走,而是力求摆脱外家部落的束缚和干预,完成由部落联盟向帝国的转轨,这往往要诉诸战争。

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我对此做了两起个案考察,即《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其结果使我深信,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

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跋部带入文明,由拓跋部来澄清北方的乱局。

北魏虽然建立了严峻的子贵母死制度以防外家擅权和母后干政,却仍然出现了冯太后弄权数十年而未被清除之事,这又是一个费解现象。排比分析有关史料,我发现除了某些偶然因素以外,主要还是由于冯太后充分而又巧妙地利用了子贵母死制度压制对手,以逞阴毒之故。把离散部落、子贵母死、冯太后擅政这几件时间并不连贯的大事串在一起,放在拓跋部族历史总的背景中考察,毕竟上下空白太多,头绪纷繁,不易掌握线索。于是我写了《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学林春秋》二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原题《我与拓跋历史研究》),剖析了自己的思路,交待了研究此题的方法,以答读者。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连载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第4期)一文篇幅较大,涉及问题较多。在探索中我被如下现象所吸引:乌桓人是两汉以来先到代北的移民,乌桓西移时间长,人数累积

多,但是在文献中他们的踪影只是偶尔出现,而且是一掠即过,不见首尾,不成气候。他们究竟在拓跋开拓代北事业中占有什么位置,有什么表现,起什么作用呢?解答这个问题,有待于对史实的索隐钩沉和细致分析。

乌桓、拓跋同俗,语言相通,但长期独自发展,不相统属。乌桓以突骑闻名,但缺乏部内凝聚力;拓跋早已形成部落联盟而自居君长地位,却不见有显赫的军事实力。两族分别从东西两面推进,相遇于代北地区,既有交往,又有冲突,但未见有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事实。可以判定,两族互补而共生于同一空间,实现着一个以拓跋为主导的长达百余年的融合过程。拓跋就是在与乌桓共生环境中发育成长的,而乌桓则逐渐被拓跋吸收,乌桓本身的历史长期被拓跋覆盖,在史籍中遗忘已久。

正史所见,王沈、范晔书以后没有关于乌桓的成篇系统记载,只能见到一点“边角料”。我在探求拓跋、乌桓关系时以《魏书·序纪》为线索,把有关零散资料的有可思考者从史籍缝隙中钩稽缀合,分成问题,构成《共生关系》一文中的各个章节。这些章节独立成说,事实不尽相贯,但又都牵扯出许多线索,勾连拓跋、乌桓,构成两族共生关系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叙述拓跋经营代北、统一北方的历史而不给乌桓以适当位置,是不符合实际的。了解代北乌桓状况,也可丰富对拓跋史的认识。我还觉得《序纪》中以及其他地方所见乌桓零星资料都弥足珍贵,可能从其中解读出不少历史信息,不过,我还未能一一清理。

十六国历史纷纭复杂,宏观言之似又简单。一个胡族乘时崛起,介入北方政治冲突,立国建号,一时貌似强大,经过后继民族几个浪潮的冲击,立刻趋于瓦解。再来一个胡族,过程大致也是如此。只有拓跋,在百余年与乌桓共生中磨练了自己,丰富了自己,造就了自己,使自己进入中原时具有比较充沛的力量和较高的文明,经得起风吹浪打。如果拓跋未曾经历这一过程,而是猗菴、猗卢乘晋室之衰,与刘、石一起逐鹿中原,可以肯定地说,它只能跟刘、石一样匆匆登场,又匆匆下场,使十六国成为“十七国”而已。

在与乌桓共生条件下经过历练的拓跋部,生命力强,富有经验,与各胡族骤兴骤灭相比,即令在衰败之后也不曾出现一个堪与匹敌并取而代之的对手。六镇浪潮的冲击不亚于十六国中任何一个胡族代兴造成的社会动荡,但是继起的任何一种力量,不论从族属还是从文化方面来看,都是脱胎于拓跋,从拓跋衍生而来,与拓跋有很强的继承关系,同前此的五胡交替极不一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大体与五胡同步兴起的拓跋鲜卑,历史地位大不同于五胡。

探索拓跋历史,反复思考《魏书·序纪》,也反复验证《序纪》,越来越认为《序纪》资料虽然简略,但准确度高,可信性大。因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魏收书疏误很多,为什么刻木结绳时代的拓跋古史,却能留下这篇可贵的资料呢?这也是一个史学史的问题。原来,《序纪》是根据拓跋先人留下的史诗《代歌》的资料,翻译整理而成《代记》,又几经演变而来的。整理《代歌》是“燕魏之际”即道武帝早期的事,其时负责协音律(包括辑集《代歌》并为之配乐)的汉士是邓渊,而邓渊恰好又是负责国史《代记》撰述的人。邓渊利用他所熟悉的《代歌》口碑资料作为主要依据,撰成《代记》,是很自然也很方便的事。《代歌》、《代记》体裁不同,表述方法各异,但内容应是极为近似。

邓渊死于一桩冤狱,他留下的早期国史《代记》,包括开国以前的拓跋史和道武帝早期历史,是以后崔浩撰修国史的一部分依据;而崔浩国史问题又酿成了一桩更大的冤狱,成为千古聚讼的公案。崔浩的罪名是其所修国史“暴扬国恶”,“备而不典”,近人文章多指为道武帝母后贺兰氏由于依收继婚制为昭成帝收娶生子而造成干名犯义诸事。我赞同此说。不过依我看来,拓跋早期历史中杀父杀妻、忤逆悖伦以及母后专擅诸事,也当包括在“干名犯义”之中,这些事比游牧族中多有出现的收娶后母、寡嫂等事更要碍眼。构成崔浩之罪的事实来源于邓渊《代记》,

邓渊《代记》中这些事实则采自《代歌》。本来只是拓跋民间用鲜卑语演唱的《代歌》，演变成官方用汉字书写的《代记》，其“不典”、“国恶”诸端尽在汉人社会里暴露张扬，以后崔浩又据以修成国史，并刻石示众，以致触怒了当权者，修史的汉士邓渊、崔浩等人自然先后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代歌》包含拓跋历史未经修饰的原始素材，邓渊、崔浩修史以之为据，由此导致两次国史之狱，是北魏一代史学衰微的重要原因。

我依据这一剖析，写成《〈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并认定《代歌》、《代记》是《魏书·序纪》的史料来源。魏收所见《代歌》、《代记》资料只能是崔浩等人所引用过的，而且已然几经删削篡改，但残余部分的明晰准确程度仍然相当高。今天在史料贫乏的情况下，只有吃透这些资料，并且尽可能发掘《序纪》中不载而他处尚存的一鳞半爪，才有可能探得一些成果，用以丰富这一段显得太单薄的拓跋历史。因此我又想到，整理《魏书·序纪》，包括对《序纪》做增补、集释、笺证、研究，是史界进一步探索拓跋史的一项重要课题。

为了尽可能利用与拓跋史相涉的资料，我写成《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燕京学报》新十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文不是文物古迹本身的考察，而是拓跋掌故的追寻，用文献中被史家弃置的史料佐证拓跋历史，想从中找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来。能否如愿，尚待检验。

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资料不足，结论难下。有时所抓住的问题旁证不少，结论依稀可见，却偏偏在某个环节上缺少直接证据，不得不出之以推测，这本来是史学文章应当慎用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随文指出证据欠缺之处，以期读者留意。

这使本书有些地方不免有逻辑上称之为丐词的毛病。《韩非子·显学》所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愚诬之学，我是有所戒惧的。不过提出了问题，不论是对是错，总会有人继续研究，也许能求得结果。

拓跋史研究有一点特殊情况，就是有些可疑而不可决的问题，所需直接史料证据可视为“不典”、“国恶”，作为史讳而为当时史臣有意裁剪涂抹，要完全靠实证来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拓跋史实上的这一“模糊区域”，明知辨识之难，为什么还要去探一探呢？

其实一部中国古史，有很多“模糊区域”，如果都丢弃不去探究，会永远是一片混沌。百年来新史料的发现，使古史多有开发，这是发现和辨识古史新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新史料并不是所在皆有，史家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眼光，多少可弥补史料的不足。对已知史料的透彻分析和反复比勘，能够增进认识。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贡献，得益于新史料者并不算多，更多的是凭借极为深厚的史学修养，凭借精微思辨，推陈出新，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提出新问题，得出高境界的新解释，使古史中的许多模糊区域得以逐渐辨识清楚。有许多前辈学人极具开拓精神，代表了一代思潮而又各具风范。他们的研究成果未必全是定论，但是他们多服膺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治学理念，相信学无止境的普遍真理，显示了崇高的学术襟怀，是我们治史的楷模。

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果能如此，即令我的某些具体见解被证明是错误的，被另一种见解取代，也很值得。也许，这可以用“得鱼忘筌”之义来理解吧！

内蒙古师范大学曹永年先生为拙文撰写补正文字,连云港市博物馆滕昭宗先生反复函酌有关史实,统此致谢。

北大的罗新君与我长年相处,协助我搜寻资料,斟酌意见,操持各种繁杂的修改事务和电脑作业,而且反复再三。罗新现在远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我期待他带回成果。